

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朱文显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炮制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而“把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①。其实，“两个估计”只是“一个估计”，即把广大知识分子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云云，不过是这个估计的逻辑引伸罢了。因此，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对于从思想理论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为了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含义，就必须首先弄清什么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俄国作家彼·得·鲍保雷金创造出来的^②。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从列宁起才大量使用这个概念，并给它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列宁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与体力劳动者相区别的脑力劳动者，一般指所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们，自由职业者（指英格兰人常说的脑力劳动工人）。”^③这个定义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重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后来马克思又以教师和演员为例，进一步阐述了这个基本观点。他说：“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④由于当时还没有通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就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具体职业来对他们进行分析的。这些分析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从总体上来说，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说，是同工人阶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工人，是使用自己的脑力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

但是，由于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而是分属于社会上的不同阶级的，因而自

然而地又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同分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第一个广泛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是列宁。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列宁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

（一）列宁曾经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经历来看，这主要是从他们家庭出身讲的。

（二）列宁在谈到要争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时指出，他们“有的当工程师和农艺师，……但他们还是过去的资产者。称号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按世界观和习惯来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资产者。”^⑦这主要是从世界观讲的。

（三）1921年5月30日，列宁在给克拉斯诺达尔执行委员会主席要求释放阿尔先尼·雅利洛夫教授的电报中说：“我可以证明，雅利洛夫无论就其财产或思想来衡量，都不能列为资产阶级。”这里所谓用财产来衡量，主要是从生活资料占有状况即生活条件讲的。

但是，应该指出，以上所引列宁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几段论述，只是表明了列宁从哪些方面来认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下定义；从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列宁著作中，也还没有发现在其它地方下过这种定义。所以，把以上论述的任何一段作为划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都是不科学的。

第（一）段是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来看的。但是，很明显，家庭出身不能作为划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否则，就必然要犯“唯成分论”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确实是有过的。1933年10月10日瑞金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在当时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曾经规定“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并且具体地说：“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这样做，势必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赶到革命的对立面去，成为“孤家寡人”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以这个文件为基础加以修改和补充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就作了原则性的修改和补充。这个文件指出：“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分决定。例如家庭属于地主的是地主出身，家庭属于富农的是富农出身，家庭属于中农的是中农出身等。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例如本人当地主的是地主，本人当资本家的是资本家，本人当自由职业者的是自由职业者，本人当职员的是职员，本人当军人的是军人等。”^⑩稍加对比就可以看出，修改后的文件将“阶级成分”改为“阶级出身”，并对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从而把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和本人的阶级成分严格地区别开来，纠正了“唯成分论”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标志着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巨大飞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党的创始人和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了家庭出身绝对不能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成分的标准，当然也不能作为认定某人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依据。

第（二）段是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来看的。世界观能不能作为划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我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早已作出了生动的回答。如上所述，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的“两个估计”实质上是一个估计，而这个估计的核心，正是认定广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

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一棒子打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从五十年代后期到1977年邓小平同志对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论断，这整整二十年中，大家主要是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的。大家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分歧。但是，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现象，它的形成也有着极其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所以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的成员都具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无产阶级则一个个都是天然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也可能具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甚至无产阶级的杰出领袖人物，也会在某些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就表明，真正树立无产阶级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毕生的自我改造过程。毛泽东同志生前也多次讲过他自己也要不断地进行改造^②，对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又怎能世界观是否得到彻底改造作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客观标准呢？

第（三）段主要是从本人的生活条件来看的。但是，它也不能作为划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大家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的革命运动，曾经当了多年的工厂股东。在我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鲁迅，也都是每月有数百元大洋收入的教授和作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也指出：“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而“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仅仅根据某个人每月能拿多少工资来确定其是否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不正确的。

（二）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谈到立宪会议时曾经指出，它联合了包括资产阶级以及“那些靠人民、靠被剥削者受到教育，却从他们当中分离出来，而去依附资本家，把自己的知识，最高的知识成就用来反对劳动者，把自己的知识变成了压迫人民的工具的人。”^③笔者认为，列宁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却道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决定某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只能是他们依附（或从属）于资产阶级并以他们的知识来为建立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资本家，但他们却是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正如列宁指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而这种利益同单纯是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暂时的狭小的利益是不同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曾经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站在反封建斗争的前列，为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大喊大叫；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用自己的知识来反对和压迫劳动人民，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出谋划策；在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本能地、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对。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

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⑤邓小平同志这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实际上为我们指出了识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客观标准。前一种知识分子“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服务也是有特定含义的，那就是“绞尽脑汁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同广大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才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其它的知识分子，则是劳动成果被剥削者所利用的问题。过去，曾经笼统地把这些知识分子也说成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仔细推敲一下，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既然我们不能把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说成是“为剥削阶级服务”，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同样参与创造剩余价值的知识分子说成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呢？

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本人是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才算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笔者在有关文章中也曾经支持过这种意见。现在看来，这种意见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知识分子既然是一个脑力劳动者阶层，那么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首先是一个脑力劳动者。所以，上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方法决定，例如……本人当资本家的是资本家”那一段话中的“知识分子”，只能广义地理解为“有知识的人”，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同的。同时，这个《决定》也已明确告诉我们：既然他本人已经当了资本家，那他的阶级成分就应该是资本家，而不应该也无必要再把他们另外叫做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依附于资产阶级并且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在这里，“依附”是本质特征，而“服务”则是依附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斯大林和我们党的很多领导人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斯大林在1936年11月25日《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苏联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完全新的、劳动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第一，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苏联知识分子80—90%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的活动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们一定为富人阶级服务，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⑥很明显，斯大林这里说的成分，实际上是家庭出身。如上所述，家庭出身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上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因而这里主要的还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1956年1月14日在他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谈到中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这里面当然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过去六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时指出：“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⑦从这句话的三个“已经”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正是把为谁服务作为区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客观标准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邓小平同志为了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彻底纠正长期以来把广大知识分子看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的“左”倾错误，曾经几次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倡广大知识分子又红又专，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们初步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

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⑤应该指出，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只是对如何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作出自己的论断，并不是要对世界观这个概念本身作新的界定。这个创造性的论断也告诉我们：只有为谁服务才是区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客观标准。

行文至此，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一个学术界争论已久、尚未取得统一认识的问题，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究竟是根据什么来划定的。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上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医生、律师、教师、诗人和演员的分析，应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即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作为唯一标准：凡靠工薪收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知识分子的主体）都应划入工人阶级；而依靠其自身的知识独立谋生者，则应划为自由职业者。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由于知识分子是一个分属于不同阶级的特殊阶层，因而应以其归属于哪个阶级即为谁服务作为确定阶级属性的主要依据。其实，这两种意见是从不同角度讲的：前者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进行划分即确定其阶级性质，后者则是对他们之中的不同部分的阶级归属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正是从阶级归属上来讲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来说，和工人阶级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阶级归属来说，又属于资产阶级，这不是矛盾的吗？笔者认为，如果说这里面有点矛盾的话，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矛盾性的反映。列宁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就他们的关系、观点等等来说，他们是依附资产阶级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寄人篱下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因此，他们又依附雇佣工人。”^⑥毫无疑问，这里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特点，周恩来同志在建国以后曾经将其概括为“两重性”，认为他们“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⑦。毛泽东同志也是在“两重性”这个前提下认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即使他在晚年错误地将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也仍然认为他们是“脑力劳动者”^⑧。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是脑力劳动者、又依附于资产阶级的这种特点，即使他们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站在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进行怠工和破坏活动，甚至参与反革命阴谋的情况下，列宁仍然认为他们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分子”^⑨，并且采取种种措施争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他认为“能够靠简直没有什么文化的无产者和资产阶级专家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⑩，并且提出要“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⑪。此外，列宁还坚决反对那些任意扩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的做法。他十分尖锐地指出：“不想弄清这些专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就把他们统统叫做‘资产阶级’专家的行为，简直是给共产党人丢脸。”^⑫列宁的这些论述，毫无疑问应该成为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指针。

（三）

建国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顶帽子，曾经使我国广大知识分子遭受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摘掉这顶帽子，周恩来、陈毅、聂荣臻和邓小平等同志曾经进行了长期和复杂

的斗争。

1956年，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第一次给广大知识分子摘掉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但是，到了1957年就出现了反复，认为这些知识分子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和聂荣臻同志又一次地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宣布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把这一切又推翻了，知识分子又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受到了打击和摧残。直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才最终地把这项倒霉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三起三落”的事实充分证明：把它戴在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是不合适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和十月革命前的帝国主义俄国不同，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半封建地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的知识分子，自然有其本身的特点。

首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极力压制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得不到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因而依附于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解放前的著作中，都没有使用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指“五四运动的右翼”即胡适、戴季陶等一类人物；一次是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政治派别并提，并未作具体的阐述^⑥。但是，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同志却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予特殊的注意。在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认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是“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在他的著名的知识分子问题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也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在旧中国，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数量很少，因而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的。

其次，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具有革命的愿望，并且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这一点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本质的区别，并且决定了它的知识分子也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陈云同志曾经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领导的。”并且举了孙中山先生为例^⑦。这就清楚地表明，陈云同志在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采取各种斗争形式，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少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建国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主观认定广大知识分子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事实上，将广大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看待，正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内容。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我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随意扩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范围的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一历史事实很值得我们深思。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更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第一，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从建国初期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原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也已经转而为社会主义服务，变成了国家的工作人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才作出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虽然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能够成为全党的认识，但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还是比较谨慎的。从1957年开始，在党内逐渐滋长了一种“左”倾错误。这种错误在政治和思想上的主要表现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反映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则是不断扩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建国初期，曾经将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和资本家并列，认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就是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以学术职称和职务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的办法虽然不一定可取，但它所涉及的毕竟还是极少数人。反右派以后“左”倾思潮泛滥，情况就不同了。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在企图复辟。能够出来和无产阶级较量的，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资产阶级就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它的知识分子身上。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就无限制地扩大起来。原来在知识分子中还分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后来认为那是迷信，因为小资产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从而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全都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并且认为是当时存在的“两个剥削阶级”中的一个。1958年又提出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仍然存在。不言而喻，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资产阶级了。“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极左，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两个估计”，更是把建国以来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统统划入另册。以上情况足以证明，1957以后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全是“左”倾错误的产物。

第二，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胡耀邦同志在谈到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们曾经长期认识不足，并且被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纠缠了多年。”^③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不是别的，正是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首先是轻视知识分子。大家知道，在旧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小农经济）占着统治地位。他们为了维持农业和手工业的简单再生产，一些粗浅的生产经验和几件简单的生产工具就够了，因而感觉不到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当然也认识不到知识分子的重要。其次是歧视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的劳动一般不直接表现在产品上，就使这些小生产者产生了知识分子是靠他们养活的错误观念。反革命分子江青所谓“知识分子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的叫喊，正是别有用心地利用了这种错误观念。加之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剥夺了劳动者接受文化科学知识的权利，“知识和劳动彼此分离，于是知识作为资本或富人的奢侈品同劳动相对立”^④，更使得小生产者总是认为知识分子不是自己人，而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所走过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决定了我们党内小生产者出身的占大多数；即使工人党员，也容易沾染小生产的意识。这也就是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这种错误观念得以长期流传的思想基础。正

因为如此，胡耀邦同志告诫全党“一定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成‘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百倍地加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①他在这里指出的把知识分子看成“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正是把广大知识分子当成了“资产阶级”。

第三，由于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所产生的把知识分子都当成“资产阶级”的偏见之所以能够长期占有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和宣传得不够。如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工人”和“雇佣劳动者”，而且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长期内对于这些基本理论并没有作过很好的学习和宣传，反而把一些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当成了马克思主义。例如一谈起知识分子，总是要把他们同有产阶级联在一起，最起码也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都是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废物，是“最没有知识”的“消费者”，因而在任何时候都是当然的“改造对象”。“知识就是力量”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讲的，就这一点说来比小生产者的思想进步得多了。在我国，知识分子早已和工人农民一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并且这支队伍还要一天天地迅速扩大。但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工作也还有待于深入。胡耀邦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办事，你说他是从‘本本’出发，实际上他连‘本本’也没有多少，是从小道消息出发，有些是从‘想当然’出发”；并说我们“要靠马克思主义吃饭”^②。应该看到，当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小生产者偏见，仍然是一股相当顽强的抵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消极力量。只有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

注 释：

①邓小平同志语。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64页。

②《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0卷第311页。

③《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8卷第309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43页、321页。

⑥列宁批判了“无等级知识分子”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依附于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99页。所引《列宁全集》系五十年代人民出版社版，以下同。

⑦⑧《列宁全集》第5卷第343页。

⑨⑩《列宁全集》第29卷第53页、55页。

⑪《列宁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下），群众出版社出版，第525页。

⑫《六大以来》上册第445页。

⑬《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⑭参见《邓小平文选》第46页。

⑮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407页。

⑯《列宁全集》第26卷第460页。

⑰《列宁全集》第9卷第200页。

⑱《邓小平文选》第85页。

⑲《斯大林文选》上册第87页。

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

㉑《邓小平文选》第40页、46页、89页。

㉒《列宁全集》第4卷第177页。

㉓《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15页。

㉔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6页。

㉕《列宁全集》第30卷第156页、192页。

㉖《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4页。

㉗《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6页。

㉘《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60页、1327页。

㉙《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114页。

㉚《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㉛《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50页。